

简·费尔法克斯与家庭教师的劳动困境

杨培雪

西华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39

DOI:10.61369/HASS.2026030031

摘 要：简·奥斯丁在《爱玛》中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家庭教师形象——简·费尔法克斯。与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妮丝·格雷、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不同，简·费尔法克斯从未真正踏入家庭教师行业，却陷入对这一职业的深切恐惧。她对埃尔斯顿夫人所说的“不是贩卖人口，而是贩卖脑力”，精准揭示了19世纪初英国无财产淑女被迫将自身教育投入劳动力市场的残酷现实。本文从“家庭教师的劳动困境”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将简·费尔法克斯与简·爱对照分析，探讨二者在面对同一职业时截然不同的反应——“恐惧”与“渴望”，如何源于她们不同的阶级、生存经验和情感。通过对比二者的“从业状态”“对待职业的态度”“情感表达方式”和“结局想象”，本文揭示了简·费尔法克斯的“未从业的恐惧”与简·爱的“从业的渴望”，是同一结构性困境的两种呈现方式，二者的差异恰恰揭露了19世纪英国女性劳动问题的复杂性。简·费尔法克斯的形象，是奥斯丁对时代女性职业困境敏锐的呈现——她的痛苦不在于劳动的艰辛，而在于劳动的想象本身已成为一种压迫。

关 键 词：简·费尔法克斯；简·爱；爱玛；家庭教师；劳动困境；职业想象

Jane Fairfax and the Labor Struggles of the Household Tutor

Yang Peixue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9

Abstract： In "Emma", Jane Austen created a unique image of a governess – Jane Fairfax. Unlike Agnes Grey from Anne Bronte's "Agnes Grey" and Jane Eyre from Charlotte Bronte's "Jane Eyre", Jane Fairfax never truly entered the governess profession but was deeply afraid of it. Her statement to Mrs. Elton, "It's not selling people, but selling mental power," precisely reveals the cruel reality in early 19th-century Britain where propertyless ladies were forced to invest their own education into the labor marke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ore issue of "the labor predicament of governesses", and compares Jane Fairfax with Jane Eyre to explore their completely different reactions when facing the same profession – "fear" and "desire", which stem from their different classes, survival experiences, and emotions. By comparing their "working status", "attitude towards the profession", "expression of emotions", and "imagined endings", this article reveals Jane Fairfax's "unemployed fear" and Jane Eyre's "employed desire", which are two manifestations of the same structural predicamen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precisely expose the complexity of the labor issues of British wome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image of Jane Fairfax is Austen's acute portrayal of the occupational predicament of women in her time – her pain lies not in the hardship of labor, but in the very imagination of labor itself becoming a form of oppression.

Keywords： Jane Fairfax; Jane Eyre; Emma; governess; labor predicament; professional imagination

引言

在19世纪英国作家笔下，家庭教师是非常常见的人物形象。然而，简·费尔法克斯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与简·爱同样面临成为家庭教师的命运，但她从未真正踏入这一行业。她的痛苦不在于劳动的艰辛，而在于对劳动的恐惧。

当埃尔斯顿夫人以“保护人”自居，热心为简张罗职位时，简这样回应：“伦敦自有这种地方，叫什么所来着，去问问的话很快就会有着落的——那里介绍人家出说的说不上是血肉之躯，要出卖人的才干尽可以到那儿找。……干这一行的，罪过固然大不一样，可是要问受害者的痛苦哪个大些，那我就不敢说了。”（《爱玛》，第259页）

将家庭教师的职业介绍所与奴隶贸易相提并论，将“出卖才干”等同于“出卖血肉”，这样的措辞为何出自一向温文尔雅的简？她从未亲历职场，为何对这份职业怀有如此深切的恐惧？

周颖在《想象与现实的痛苦》一文中将简置于家庭教师谱系中考察，指出她的痛苦主要是“停留在想象层面的臆测”。这一观点颇具启发性，但仍有深化空间：简的“想象”是否也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她的恐惧能否完全归结为个人未能正视现实？

本文尝试将简·费尔法克斯与简·爱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二者在面对同一职业时截然不同的反应——“恐惧”与“渴望”——如何源于她们不同的阶级位置和生存经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情感劳动”理论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通过对比分析，本文试图回答：简·费尔法克斯的“未从业之恐惧”与简·爱的“从业之渴望”，究竟是同一结构性困境的两种呈现，还是截然不同的生存选择？

一、家庭教师的“劳动困境”的形成

1851年，英国有25,000名女子从事家庭教师职业^[1]。普通家庭女教师年薪约30英镑，且极不稳定，夏洛蒂·勃朗特1841年担任家庭教师时年薪仅20英镑^[2]。中产阶级女子可选择的职业极其有限，用哈丽雅特·马蒂诺的话来讲，“除了教书，当裁缝，做女帽商，别无他路”^[3]。1847年《家庭女教师慈善机构年度调查报告》指出，在精神病院的病人中，女教师所占比例最大。这些数字揭示了一个悖论：家庭教师是体面的职业，却以牺牲身心健康为代价^[4]。

工业革命后，机器大生产取代家庭手工，生产场所从家庭转向工厂，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全面确立。中产阶级女性被逐步剥离出生产领域，角色发生异变——从经济支撑者沦为丈夫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装饰品”，成为仅供观赏的“奢侈品”。资本主义制度构建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将女性禁锢于家庭，其社会功能被窄化为生育子女和证明丈夫的阶级地位。这一制度性安排从根本上否定了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合理性，斩断了女性劳动与社会价值、经济回报的关联。大多女孩到了16岁的年纪“不过会几首琴曲，能作几幅画，懂一点法文”，从未接触过职场所需的专业能力，完全与社会职场脱节^[5]。

比物质贫困更难承受的是精神层面的尴尬。家庭教师按出身与教养属于淑女阶层，但从受雇于人、领取薪酬的工作性质来看，又与仆役相近。简·费尔法克斯“是个孤儿”，“从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几百英镑，要靠这点钱独立生活是不可能的”^[6]。她希望与雇主平等，却难以实现；期盼得到尊重，却很难获得。家庭教师往往只能孤身一人、独自承受，被要求“温柔开朗”、“乐于施惠”，将情感状态作为劳动工具。这种情感劳动的长期压抑，成为精神崩溃的诱因。

家庭教师的痛苦“有现实的依据，也有想象的成分”。简的特殊性在于，她的痛苦“主要是停留在想象层面的臆测”——她从未亲历其中甘苦，却已被恐惧压垮。那么简的“想象”从何而来？

二、简·费尔法克斯的“职业恐惧”

在《爱玛》书中的第二卷第十七章中，埃尔顿夫人殷勤地给简介绍工作时，简不胜其扰，于是说出了一句：

“干这一行的人，罪过是大不一样的，但是说到受害人，很

难说哪一行的人吃的苦头更大。”

简将家庭教师的痛苦与奴隶相比，她从未经历家庭教师的实际生活，她对这份职业的理解完全来自想象。但正是这种想象，让她感受到了甚于奴隶的痛苦。

周颖指出，奥斯丁对简“那言过其实的痛苦和强加于自己的恐惧又实在不以为然，不免于同情中掺一点戏谑”，认为其恐惧带有夸张色彩^[7]。但另一种解读是：无法直面现实、无力掌控命运，才让想象成为更沉重的压迫。这种痛苦并非来自自己发生的屈辱，而是源于悬而未决的未知：它无从验证，无法消解，始终悬在头顶，像无形的枷锁日夜啃噬内心。

“城里有些事务所，去找他们总会很快就有结果的——那些营销事务所——倒不全是出卖人身的——而是出卖脑力的。”（爱玛，第二卷，第十七章）

简将教书称为“出卖脑力”，将自己的才华比作待价而沽的商品。这一表述揭示了家庭教师职业的本质，它要求从业者将自我的教育、才艺、情感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简所受的教育——钢琴、法语、礼仪，本应是“淑女”的修养，却成为谋生的工具。她不是作为人被需要，而是作为技能被购买。家庭教师的工作要求她付出情感，但这些情感不是自然的流露，而是职业的要求。当一个人的智力可以出卖，当一个人的情感成为劳动工具，自我认知就成为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简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自我异化的恐惧。

“她早就下了决心，把这个期限定在二十一岁。她怀着虔诚的见习修女的那种刚毅精神，决心在二十一岁那年完成这种献身，放弃一切人生的欢乐、正当的来往、平等的交际、宁静和希望，永远过着苦修苦行的生活。”（爱玛，第二卷，第二章）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简对待职业的态度是消极被动的。她并不是主动地进行职业规划，而是被动地等待“二十一岁”这个年龄的到来。在这段时间里，她虽然像另一个女儿一样，享受着上校家的温暖，可是她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有期限的。等到上校的女儿出嫁了，她就真正到了需要工作的时候。逃避和拖延成为了她应对恐惧的方式，她通过跟弗兰克私定终身，寄希望于婚姻摆脱宿命。这个做法对她来说既是希望也是逃避的另一种表现。她始终是在等待被别人拯救，而不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在整部小说中简身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沉默。从情感劳动的角度分析，她的沉默不是天性使然，而是对未来职业的提前预演。简必须克制自己的爱慕，压抑对自身前途的绝望，还得把

对爱玛微妙的嫉妒掩藏起来。这种日复一日的情感克制，正是家庭教师这一行业的核心劳动内容。和沉默一起出现的还有她经常出现的头痛。书中写道：

“她头痛得厉害，还发着高烧，他怀疑她能否如期去斯莫尔里奇太太家。”（第三卷，第九章）

简的这种恐惧其实也是一种集体意识。上校一家口中的“令人心酸的日子”，本质上反映了19世纪英国现实问题，女性一旦阶级跌落就无法挽回。在书中的第二卷第二章，爱玛也为简暗自惋惜，“她要从什么地位上跌落下来，以后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这种惋惜本身就暴露出当时的社会共识：家庭教师不仅代表职业，而且意味着地位的跌落。更关键的是这种来自于外界的压力最终形成了简的自我认同。这种内化后的恐惧表现出来就是她的沉默、压抑，和头痛。她的恐惧是无数进入这一行业的女性的恐惧，她们恐惧失去自己，恐惧被困在情感劳动的规训之中。

三、简·爱：“从业”的渴望与劳动实践

与简·费尔法克斯不同，简·爱自始至终都能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家庭教师这份职业。在《简·爱》第十章中，简·爱离开洛伍德学校，找家庭教师这一工作时，会把工作叫做“servitude”，在中文语境下，可以翻译成“苦役”。这一说法跟简·费尔法克斯所说的“出卖脑力”相对应，可是两个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9]。简·爱清楚认识到职业的束缚与艰辛，选择坦然接受。对她来说，当家庭教师虽然意味着屈从和劳累，可这也是她能让自己脱离衣服比人实现经济独立的唯一途径了。

“它不像‘自由’啦、‘兴奋’啦、‘享乐’啦那些字眼，听起来确实很愉快，可对我来说，它们只不过是声音而已，而且是那么空洞，那么短暂，去听它们只是浪费时间。但是工作！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事。”（简爱，第十章）

当罗切斯特试图用珠宝来把简·爱装扮起来，她回应：“‘我可不是天使，’”我断然地说，‘至死也不想做什么天使。我就是我。罗切斯特先生，你千万别指望也别强求我身上有什么至善至美的东西。’”（《简·爱》第24章）

这句话表明，简·爱拒绝被塑造成理想的女性形象，坦然接受自己是一名劳动者。她坚持继续担任阿黛尔的家庭教师，“我要继续做阿黛尔的家庭教师，用这来挣得我的食宿费，外加一年三十镑的薪水。我要从这笔钱里来开支我的衣着，你什么也不用给我，除了……”（《简·爱》第24章）

对简·爱而言，一旦接受对方的供养，便可能丧失人格独立，沦为被观赏的“玩偶”。职业成为她守护独立的重要支点。

简·爱在桑菲尔德的屋顶上有一段著名的独白：“我相信我跟我是同一类人——我懂得他面部的表情和一举一动的意思。虽然社会地位和财富把我们远远地隔开，但是在我的脑子和心灵里，在我的血液和神经中，都有着一种东西使我在精神上和他息息相通”（《简·爱》第12章）

这段诉求既是对爱情的向往，也是对平等的追求。从情感劳

动的视角看，这是对压抑的反抗——简·爱拒绝隐藏自己的情感，拒绝成为“顺从”的家庭教师。当她对罗切斯特说出“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简·爱》第23章）时，她完成了一次情感劳动的反抗。然而，这种反抗也有其代价：她的注意力从职业本身转移到了爱情上，使职业成为通往婚姻的中介。

简·爱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她的自尊与自立。罗切斯特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扮成吉卜赛女巫时，他替简·爱说了这么一句段话：“如果自尊和环境需要，我可以一个人生活，不必靠出卖灵魂去换取幸福。我有着天生的精神财富，哪怕外在的一切欢乐全被剥夺，或者只能用我出不起的代价才能获得，它照样也能支持我活下去。”（《简·爱》第19章）

这与简·费尔法克斯的“等待被拯救”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简·爱的“独立”也并非没有边界。她最终通过婚姻和遗产才获得经济上的保障，并不是依靠职业本身。即便到了简·爱这里，职业也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它更像是通往婚姻的桥梁。

简·爱的结局同样未能超越所处的时代局限：她最终与罗切斯特成婚，又意外继承了一笔遗产，由此才成为一位“独立”的女性。倘若简·爱并未获得遗产，而是一直以家庭教师的身份谋生，那她是否还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小说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9]。从这一角度看，简·爱的“渴望”与简·费尔法克斯的“恐惧”其实殊途同归。两人都将婚姻视作摆脱困境的最终出路，区别仅在于姿态：后者因阶层压力而惶恐等待，前者则以更主动的方式奋力追求。

四、幸福结局的意识形态

奥斯丁为简·费尔法克斯安排了一个喜剧式的结局。她跟弗兰克之间的误会最终澄清，这样一来她就无需自谋生路了，“重又过起了舒舒服服的生活，静候佳期的到来”（《爱玛》第3卷第18章）。从这个结局能够看出，简成功逃避了家庭教师这份职业，不必“出卖脑力”，也不用承受那份职业里的屈辱与辛劳。

然而，这一结局也消解了小说提出的“劳动困境”。简的恐惧被证明是“多余”的——她最终没有成为家庭教师；她的痛苦被证明是“想象”的——现实的结局如此圆满；职业问题被婚姻问题取代——只要嫁对人，一切困境迎刃而解。正如周颖所言，简的态度和命运“反映了19世纪的女性处于依附地位并习惯于依附的事实，展现了一个女性群体对就业的社会集体意识和由此带来的紧张心理”。奥斯丁看到了女性职业的困境，却用婚姻想象消解了这一困境；她让简说出了“贩卖脑力”的残酷真相，却用幸福结局掩盖了这一真相的尖锐性。

与简·费尔法克斯相比，简·爱的结局同样耐人寻味。她获得遗产，与罗切斯特结婚。家庭教师这一职业在结局中只是中介，它让简·爱进入桑菲尔德，遇见罗切斯特，但最终被婚姻取代。简·爱在婚前提议继续担任阿黛尔的家庭教师，但这只是提议，最终并未实现。她真正获得独立的方式是来依靠血缘关系

获得遗产，而非来自职业劳动。

从这一角度来看，简·爱的“渴望”与简·费尔法克斯的“恐惧”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两人都将婚姻当成了摆脱困境、实现安稳人生的最终出路，区别仅在于姿态：简·费尔法克斯因阶层与处境带来的压力而惶恐地等待；简·爱则以更主动、更坚定的方式奋力追求。但无论是等待被拯救还是主动追求，婚姻始终是她们唯一的出口。在19世纪初的英国，婚姻仍然是女性对于幸福结局的唯一想象。

小说中真正反映了现实的地方，是被简·费尔法克斯的命运所遮蔽的贝茨小姐。她同样是出身绅士阶层的淑女，同样贫困，可她既没有简的美貌，也没有才艺和运气。她的命运其实是简的“镜像”：如果简没有遇到弗兰克，或是她的秘密订婚失败，她就会变成另一个贝茨小姐，再无翻身之日。

奥斯丁对贝茨小姐的描写充满了复杂的意味。她是海伯里小镇上人人取笑的对象，贫穷唠叨，却始终保持着一份可怜的体面。爱玛在野餐时对她的当众羞辱，恰恰暴露了特权阶层对边缘女性的无情碾压。贝茨小姐的存在提醒读者：简·费尔法克斯的幸福结局是例外，真正的“劳动困境”并未解决，只是被个人的幸福所遮蔽。

在《简·爱》中，这样的“镜像”角色是伯莎·梅森。那个被关在桑菲尔德阁楼里的“疯女人”^[10]。伯莎其实就是简·爱不愿成为、但可能成为的另一个自我：要是简爱当初没有离开桑菲尔德，要是她接受了罗切斯特的拯救，要是她在婚姻中丧失了自我，那她可能就会像伯莎一样，被囚禁、被异化、被剥夺话语权。伯莎的存在，与贝茨小姐一样，都是在无声的质问着女主角的那个幸福结局。

想象既源于现实，又参与建构现实，更可以成为揭示现实、反抗现实的力量。在简·费尔法克斯身上，想象的功能清晰可见。首先，它扎根于现实，她的恐惧源于对家庭教师真实处境的认知，那些关于“屈辱与辛劳”的描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19世纪英国女性劳动困境的真实写照。其次，也构成了现实，她的恐惧本身成为一种压迫，塑造了她的行为和心理，让她在二十一岁倒计时中煎熬，让她的沉默成为一种自我保护，让她的头痛成为情感压抑的躯体化表达。最后，它揭露现实，她那句“不是贩卖人口，而是贩卖脑力”，成为揭露时代女性劳动困境的经典证词。

然而，想象也有其限度。奥斯丁可以让简道出真相，却无法让她超越时代——她最终还是要靠婚姻得救，而不是靠劳动解放。简·费尔法克斯的劳动困境，在小说中被想象照亮，又被想象遮蔽。

在简·费尔法克斯之后，艾格妮丝·格雷和简·爱将亲历她所恐惧的一切。安妮·勃朗特在《艾格妮丝·格雷》中，以亲身经历，真实地再现了家庭女教师的心理创伤和精神痛苦；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则对这一困境进行了回应。她们的故事说明：想象的痛苦，也许不如现实的痛苦沉重，但恰恰是因为有简·费尔法克斯的恐惧，才有简·爱的反抗。

五、结语

简·费尔法克斯是一个独特的家庭教师形象：她从未真正地从业，却承受着对职业的深切恐惧，说出了比亲历者更尖锐的真相。她的困境不在于劳动的艰辛，而在于对劳动的想象本身已成为一种压迫。

这种想象来自于结构性的社会现实，家庭教师的工资低廉、情感劳动被剥削；也源于她作为“淑女”的阶级位置，她被教育成依赖的人，却被迫面对独立。想象与现实的交织，构成了她无法挣脱的精神牢笼。

她选择了等待。等待弗兰克，等待婚姻，等待被拯救。这种选择有其合理性：在19世纪初的英国，婚姻确实是女性唯一的一条体面的出路。但这种选择也有其代价：她的沉默隐忍和逃避，让她被困于阶级意识形态的铁网之中，无法真正直面现实。与简·爱相比，简·费尔法克斯的恐惧更被动、更压抑，但二者都未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婚姻，才是她们共同的归宿。

奥斯丁以她独有的敏锐，通过简·费尔法克斯这个边缘人物，描绘了一个时代的女性职业困境。她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但她让简提出了“贩卖脑力”这个说话，让读者看到了恐惧如何成为压迫，简的“幸福结局”只是例外。

恰恰是因为女子地位低下、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事实，才产生了如此痛苦、微妙、复杂的心理。正如周颖所言，想象既扎根于现实，又参与建构现实，更可以成为揭露与反抗现实的手段。

参考文献

- [1] See Angeline Goreau, Introduction to *Agnes Grey*, Penguin Classics, 1988, p. 39.
- [2] 简·奥斯丁, 孙致礼. 简·奥斯丁文集 爱玛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3.08.
- [3] See Ruth Brandon, *Other People's Daughters: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overness*, London: Weidenfield & Nicolson, 2008, p. 1.
- [4] *Jane Eyre: an Autobiography*, Edited by Currer Bell, 3 vols, London, 1847.
- [5] 姜麟. 叙事策略与女性意识的建构 [D].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 [6] 周颖. 想象与现实的痛苦: 1800-1850 英国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教师 [J]. 外国文学评论, 2012, (01): 94-108.
- [7] Anne Bronte, *Agnes Grey*, Penguin Classics, 1988.
- [8] *Governesses' Benevolent Institution—Report for 1847*, *Quarterly Review*, lxxxiv (December 1848), p. 177.
- [9] Mary Poovey, *Uneven Developments: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Gender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129.
- [10] 夏洛蒂·勃朗特, 宋兆霖, 顾之川. 简爱 [M]. 郑州: 文心出版社, 2023.06.